



苏联功勋播音员

〔苏〕 波·利亚森科著
齐越 峻岭 译

苏联功勋播音员

〔苏〕波·利亚森科著

齐越 峻岭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七月

DM 11 / 10

苏联功勋播音员

[苏]波·利亚森科著 齐越 峻岭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沈阳铁路局锦州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092—8/k5

1092×787毫米1/32 5.25印张 116.5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00元

作 者 的 话

我学朗诵已经有四年半了。我非常喜欢听无线电广播，喜欢听播音员的播音。但是如果我也跟着许多同行后面说，我搞无线电广播是偶然的，那读者一定会谅解我。我搞无线电广播不仅出于偶然，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我的命运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事情很有趣，我决定略微谈一谈自己，这也是因为我谈的是关于广播，而且只是关于广播……

我正在大学学习并担任团组织书记期间，有一次，我们学校来了一位记者，要我在电台谈谈大学生的生活。当时，我到录音室录了音，并立即听了自己的录音。编辑夸奖了我，但我并没有感到高兴。从录音室出来回家时，我不愿再想起话筒前完成的这一音调不好的处女作。

但是过了一个月，广播电台打来电话。打电话的还是那位记者。

“我们这里正在举行播音评比，”他说，“我提供了你的讲话录音，结果你的录音受到好评。人们要我向你建议当播音员。不管怎样，是我发现了你……学校方面大概没有问题，我们会给校长发去调函……”

我原以为记者在开玩笑，但当我了解到他是认真讲话的时候，我开始有点不自在，因为事情太突然了，而且我担心，等明天这位记者清醒过来以后，他会收回今天他说的话。我多么想当一个播音员啊！

……记得还是在战前，当时我们全家住在西伯利亚的一

一个小城市米努辛斯克，我那时已经上学。有一次父母指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妇女，贴在我的耳边说：“卓娅·凯特曼诺娃！”我屏住呼吸，一直望着卓娃消失在街的尽头。卓娅·凯特曼诺娃是一个播音员，每天晚上播送十分钟的《最后消息》。从父母脸上的表情看，她不仅仅让我一个人的心感到激动。可不是吗，这么一个有名的，有文化的，无所不知的女播音员，还有一副多么悦耳动听的嗓子……

这个职业，当时在我看来是那么有意义，又是那么神秘！但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播音员。我幻想着当一个歌手或演员。

1943年，我听到了尤里·列维丹的播音。他播的是关于我军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取得胜利的公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惊人的。但我当时还是想当一名歌手或演员。

战后我进入高尔基戏剧学校，这一行动在父母看来是不慎重的。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入了大学的地质地理系。就这样，已是二年级学生，从事着共青团的工作，戏剧已被遗忘——现在突然从广播电台打来了电话。值得认真考虑一下。

校长同意我到广播电台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最初我得到了奥里嘉·米哈伊洛夫娜·叶戈洛娃的帮助，她是第一流的播音员，是我忠实的聪明的朋友。她当时就已然出色地朗诵最复杂的稿件。她的播音，声音响亮质朴，充满热情。奥里嘉·米哈伊洛夫娜成为我对待工作的榜样。是她帮助我逐渐成长起来，是她第一个对我说：“写点关于无线电广播方面的东西吧。”当我以优异成绩在大学毕业并被要求当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我留在话筒前工作的愿望了。也许是每个播音员，甚至是一个平庸的播音

员，由于自己不平凡的职业也能享有的那种声誉，对我这样选择起了点促进作用吧。但是，对于这种声誉，你会很快习以为常，而当你深入日常工作的规律，习惯了自己的工作以后，你甚至会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人们回顾些什么呢？”

而人们回顾是有原因的。

播音员——这是一种稀罕的、特殊的、有意思的、人们不大了解其内情的工作。描写这种工作非常困难。我早已开始写有关播音员的特写，而敢于冒险来写一本书，则全是由于朋友们的压力。冒险的结果如何，只有让读者来评判。我只知道，我打算带着一种偏爱的心情，讲述一些全神贯注于自己事业的人们；我完全不想吓唬那些渴望在话筒前工作的人，或者说，完全不想在我的主人公头上罩上一个受难者的光环。谁要是需要的话——话筒会一劳永逸地吓跑他，而我的主人公们则把创作的痛苦看作一生的幸福。

我还非常喜欢他们那种顾全大局，不因琐事而叫苦的本事。播音员和新闻记者不同，新闻记者常常用一半笔墨谈论自己的职业，为小城市的旅店没有舒适的床铺，为雅库梯森林里的地震中心没有柏油马路而诉苦；可是，不论是叶利扎维塔·奥特雅索娃，还是弗拉基米尔·盖尔奇克，他们都从来不计较这类生活细节……

本书写成后，我曾有好多次想加以修改，因为我偶而发现，书中所有人物都是因偶然机会搞起无线电广播的。最初，这使我感到沮丧不安，后来我理解到，这并非不幸！重要的是他们在广播岗位上，没有成为偶然的过客。不仅如此，没有他们，广播也许会变得黯然失色。

目 录

尤里·列维丹和他从事的职业

..... (1)

象对成年人一样，只是更好些

——李特维诺夫和儿童广播

..... (26)

我所敬爱的人——奥特雅索娃

..... (58)

同维索茨卡娅的谈话

..... (83)

当我听斯皮朗托娃广播时，我看到了什么

..... (109)

美的探索者——盖尔奇克

..... (138)

译者后记

..... (封三)

尤里·列维丹和他从事的职业

我同列维丹相识已有三十年了，尽管他最初对此有点莫名其妙：哪有这么久？要知道我们是1955年才见面的呀！尽管我从我的杂乱无章的档案库里一时没有找到根据，但我还是坚持：“三十年！或者接近三十年！”可是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所需要的信件。所以我才能向尤里·鲍里索维奇·列维丹讲述下面的一段故事。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由于命运的安排，我们来到了一个遥远的接近原始森林的村庄里。在这里由于缺乏电力，其它节目不转播，只在播读苏联情报局战报的时间里可以听到广播。因此我只记得战报，这些战报象一副连续不断的链条，把有时是惊心动魄、有时是欢欣鼓舞、有时是使人痛苦不幸的事件串联起来，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非常爱听战报，我们期待着战报，这种期待的心情就象是我们对前线和前线战士——我们的父老兄弟经常怀念一样延续不断。由于担惊受怕，我们彻夜难眠。那时我们就暗暗地甚至是有有点迷信地期待着：也许播音员明天会突然宣布一个意外的消息，我们的心脏会一下子紧张地跳动起来，而一切忧虑都会消失在九霄云外。

一条长约七公里半的大街，两头连着旧西伯利亚大道。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庭前的花圃。村子中心，在四面通风的山丘上有一所用大圆木建造的寒冷的校舍。积雪堆得象房顶一

样高，冬天，牲口棚旁边常常有狼的足迹，到了夏天，村子四周宽阔的沟壑里，野芍药如同绚丽多彩的湖泊泛着一片片深红的光辉。这就是我们的村庄。我们青少年也象成年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明天，等待着前线来的信件，而对于半饥半饱的生活却已习以为常，漠然处之。只是在蘑菇和野果子成熟的季节，我们才真正想到找点吃的东西。

这是多么久远的年代啊，它在我的记忆里已蒙上一层云雾。每当回想起来，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却又油然产生一种感情，一种为自己具有能亲身承受战争重负的耐力的自豪感。当年比这些更困难的生活还多得很。即使你当时是一个小孩子，只要曾经在一个饥寒交迫、充满惊慌和愁苦的村子里度过战争的岁月，也足以使你一生难以忘怀。但在我们的道路上毕竟还有过欢乐……

1943年8月，我们一群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轮流摇动着发电机的把手，电流通向电影放映机。在集体农庄的食堂里，窗子挂上了深色的绒布。这里早已无人用餐，可是《夏伯阳》却在这里上映了近百次。幕布上的图象有时变得暗淡不清，这是因为摇把手的人已经耗尽气力了；有时却突然变得透亮，这就是说把手上增加了援军。没有声音，胶片是旧的，但没有人抱怨。我们的心同那些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红色战士们的心一起跳动……这时突然有人猛地拉开房门，闯入食堂高声喊道：

“那里……在广播……关于别尔哥罗德（乌克兰的城市——译者注）的公告……在广播胜利的消息！”

我们一起奔向区委会，奔向俱乐部，我们手里还拿着凳子，（我们从家里出来总是带着凳子）。我们的光脚丫子扬

起了一片灰尘，这种情况在村子里已经多年看不到了。扩音器放在区委办公室的窗台上。黑色的纸盘子（当时的扩音器很象一个纸盘子）不能使声音振动，但我们却觉得从里面发出了响亮有力的金属声。我们屏住呼吸，那清晰的、充满弹性的语调深入人心。这是尤里·列维丹在广播。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可我当时只觉得敌人的大炮在熊熊燃烧，灰色的坦克翻倒在地上，战场上的军队象滚滚的波浪向前涌进。顿时犹如雨后天晴，一片霞光从天际照到我们村庄的上空。天空已没有烟雾的痕迹。草原上干枯的、被坦克履带搅在一起的杂草和花朵已不再燃烧。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胜利。

当天夜里我就给尤里·列维丹写了一封漫长而无条理的信。我知道，我写得很不好，说了一些不需要说的话，特别是信的结尾更荒唐“当你宣读关于我们英勇的军队在别尔哥罗德附近取得胜利时，你是在站着还是在坐着？”当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想，列维丹在播读那个历史性的报道时，也许是在一个大广场上。

信发走了。我知道，它要很久才能到达莫斯科。而且我也没有指望得到回信，因为我想列维丹不回信是有理由的：如果都回信，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一个非常暖和的秋天。下课后我们奔向松树林，采集甜蜜的稠李果，直到天黑才大筐小筐满载而归。

厨房里灯芯闪着光亮，屋里很安静，可我知道，家里的人并没有睡觉，而是在等着我。我把稠李果放在桌上，发现桌子角上有一封信，是从莫斯科寄来的。由于字迹生疏，吓得妈妈没敢拆开。信是列维丹写的。列维丹为复信过迟而表示歉意，并对我信中所说的热情的话表示感谢，他为遥远的

西伯利亚能非常清楚地听到他的广播而表示高兴。他写道，他一点也不老，只有二十七岁，信的末尾加了一句：“我播音时是坐在一个小小的播音室里，面对着话筒，但在当时却想着全世界……”

我带着信跑遍全村，读给所有愿意听的人。从此我无条件地把自己列入列维丹所熟习的人们的行列，并幻想：“有朝一日也许能和他见面和交谈……”

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竞赛中被选拔到莫斯科电台。和现在一样，播音员是分成作业班工作的。我和列维丹在一个作业班里一起工作了好几年。领导作业班的是一个可爱的妇女，高级播音员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齐乌诺娃。在我们作业班里工作的还有卓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维克多罗娃、丽达·切尔内赫、阿里贝尔特·杰尼维奇以及年轻的、很有才华的丹娘·格列科娃。

列维丹上夜班时通常都带着听众给他的来信，并在休息时认真作复，规规矩矩地写清地址。

有一次我问他：

“尤里·鲍里索维奇，难道你对所有的来信都复信吗？”

“你犯什么傻？”他很惊奇地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对谁都复信吗？如果我能复，当然复，如果不能，我就上交。”当时一个青年人问道：“要是宇航员来信怎么办？”

“那我就寄给星星所在的城市。让内行的同志解释吧。”

后来，列维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向我谈了他自己。

列维丹的童年是在克里亚斯玛河边的一个古老的俄罗斯

城市弗拉基米尔度过的，父亲在一个作坊里当裁缝，母亲照料家务。家中与艺术界有关的人只有叔父，而且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是“业余爱好者。”他叔父同诗人别济缅斯基一起参加了建立第一批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后来又筹建了青年朗诵剧院、木偶剧团。叔父培养了尤里从小就对诗歌、戏剧、歌咏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在学校时人们都说，尤里·列维丹将来一定会成为演员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列维丹家的楼下住着一个剧院的理发师。有一天他请小尤里帮助他往剧场运假发。尤里帮他运到剧场后就留在那里看戏。从那时起尤里就成了剧场的常客。这位邻居在尤里头上装上已经变硬的假发，并在他头上梳起假发来。他尽量熬过了这漫长的毫无意义的时刻，然后就赶紧跑到后台站着看完多幕话剧，并且几乎每晚如此。他最喜欢看有音乐伴奏的演出，因为演员既能演戏，又能跳舞唱歌。有好长一个时期，尤里·列维丹产生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幻想——当一名歌手同时又是举重运动员。也许就人的本性来说，艺术和体育的这种结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要由生活本身来作出结论才更自然一些。

在列维丹上的那所学校里组织了一个《苏联电影之友》小组。年轻的苏联电影艺术当时正处在形成、探索、实验时期，围绕这门艺术展开了不少热烈的辩论。不论是观众还是评论家们，都在就电影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蒙太奇的可能性问题展开争论……。尤里·列维丹是电影的最积极的崇拜者之一，当然对小组中进行的辩论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对电影迷恋得那么强烈，以至在1931年秋天，在他们读完了九年级之后，学校竟然派尤里和他的同学

谢辽沙·别德雷瑟夫到莫斯科去报考电影学院。两位朋友便出发到首都去了。

首先使招生委员会感到为难的是这两位中学毕业生的年龄：他们刚满十五岁。电影学院没有接受他们。他们不想在考试失败后马上就回到弗拉基米尔，必须找一个地方落脚。两位朋友整天到处看招工的广告，不管什么工作只要能找一个就行，但毫无结果。不管怎么节省，钱也快花光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好象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而谁也帮助不了你。

这时两位朋友已经决定“偷偷地”返回家，去进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却忽然看到一张招考播音员的广告。播音员是干什么的？当时对于播音员这种职业，不论是一些小册子还是百科全书都还没有刊登过有关的文章。“播音员”这个名词只是在195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才第一次出现。

两位朋友去找广播委员会。路上他们决定先打听一下“播音员”是否就是指在电台广播的人。一个很有风度的太太刚刚从叶里谢耶夫商店走出来，她沉思了一下说：“我没有把握，不过我想，你们是对的。”

“喂！怎么样，朋友，走吧？”谢辽沙问。

“豁出去啦！”尤里拿定了主意。

到达之后，他们发现原来他们是九百人中的两个。他们在广播大厦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异，那么充满神秘。两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人细心观察电台工作人员的面孔，想猜到这里谁是播音员。可能是这位有着松软头发和鹰鼻子的美男子？也可能是这位有着灰白头发的巨人？当他们听到招生委员会的女秘书向他们宣布了以下警告以后，

却又产生了不如回家去的念头。女秘书说：“年青人，你们反正通不过下一轮的考试，特别是你，年青人，你叫什么？列维丹？……是这样，列维丹，你的伏尔加河地区的方言口音，怎么能行呢？……”旁边站着几个伶俐活泼的莫斯科剧院的演员，他们也是来这里参加考试的，他们围住这位女秘书，把胳膊肘压在她的小桌子上，象对家里人似地请求：“给小伙子们一点关照”，“作个给人带来幸福的慈善的菲亚吧。”“您看他们是多么可爱，多么纯洁呀！……”他们不知还说了一些什么笑话，开了一些什么玩笑。女秘书被软化了，可以参加考试的问题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解决了。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很快就出现在主持选拔未来播音员的考试委员们面前。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是谁？”主席改用孩子似的腔调问道。

小伙子没有回答。

“列维丹·尤里。”女秘书答道。

“来自何处？”

“来自弗拉基米尔。”又是女秘书偷偷地提示说。

“他自己会说话吗？”主席感到惊讶。

“大概会吧。”女秘书耸了耸肩膀。

“你真的想当播音员吗？”

“非常想。”青年人小心翼翼地，声音很柔和，但字母“O”的发音很圆。

考试委员们很自然地互相看了一眼。小伙子把该发“呵”的音读作“噢”。对播音员来说，这是一个缺陷。

“青年人，你是伏尔加河地区的口音，是地方的方

言。”主席说。

尤里对这种使人感到有点厌恶的语言本想保持沉默，并立即走开。但是他突然为自己祈求道：

“那有什么？难道就一点不能纠正吗？”

他用一种特殊的浓重的低音说话，这种语调可以使你感到困惑不解，同时又藏有某种隐秘的希望，委员们再次陷入了惊讶的状态。他们终于决定：“的确，为什么不让他试一试呢？”

“请读一点东西。”

尤里读了一篇简讯，又读了一篇。除了把该发“呵”的音读成“噢”，挑不出别的毛病，而他的声音在当时却表现得与众不同，几百个渴望成为播音员的考生都无法与之相比。教师们开始估量着，如果排除考试时的激动，排除在这种场合自然产生的肌肉紧张，当这个青年人一旦掌握了播音技巧之后，这种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独特的音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几轮考试列维丹都顺利通过。他被电台录取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暂时他要一面在播出部值班，一面学习专业技能。他的住所被安排在播音室上面存放唱片的音乐室里。不过这个住所对尤里来说好象并不需要，因为他是如此坚持不懈地从早到晚都在调度室，翻阅写满字迹的笔记本和剪报。他又是背诵绕口令，又是高声朗读报纸上登载的各种题材的大块文章。夜间他常常突然出现在播音室，收听他感兴趣的新闻。他用尽全力来摆脱听起来是如此亲切、为此柔和、如此习以为常，但对文学语言专家却不合胃口的伏尔加河地区的“噢”音。可是这个“噢”音不是纠缠不已地、接连不断

地几乎在每个字中出现，就是由于这个新手的过分努力，在不应该出现“呵”音的地方也变成了“呵”音。

总的说来，是够麻烦的。

但是过了两个月，尤里便被允许在夜间的广播节目中，播送一些简讯，主持唱片音乐会，报告节目单等等。他认真地准备每一个节目，就象虚荣心很重的议会议员准备第一篇演说那样，把每一个音节都读得清清楚楚。

很快便举行了新的审听会，他在播出部担任值班的工作也就在当天结束了。

许多热心的教师，为培养列维丹成为今天这样卓越的播音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列别杰夫——一个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对论证过去谁也不清楚的播音职业的初步规律具有特殊本能的人；亚历山大·尼科拉耶维奇·沃罗诺夫——文艺朗诵课的卓越教师；叶里扎维塔·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尤斯维茨卡娅——一个外表严厉，要求严格，但在给学生传授掌握语言技巧的丰富经验方面，非常慷慨的教师。

列别杰夫教导播音员在话筒前必须聚精会神。他从让学生掌握稿件的严整逻辑，集中精力于朗诵材料开始。他对语言上的漫不经心、把一篇简讯当成小玩艺儿“随便应付一下”的态度非常反感。对于匆匆忙忙，追求表面效果的做法，他同样要加以训斥——虽然讲究方式，但决不白白放过。他既不能容忍虚假的热情，也不能容忍冷淡无情。他说，一个播音员只有对他所播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才能使他走上充分发挥他的天赋才能的道路。

大概很少有别的新手能象列维丹那样满怀信心地不断积

蓄一个播音员应当拥有的雄厚力量。他在克服由于在“噢”音搏斗时采取硬性自我控制所引起的拘谨之后，便开始一点一滴地、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迅速掌握了播音艺术的规律。他的无比有力的声音变得更加浑厚起来。他的身体并不象表面看上去那样强壮。全部问题在于音色，他的音色不论高低都听得非常清晰，就象金属上面蒙了一层丝绒。列维丹在话筒前从不撕破嗓子喊叫。他充满富有激情的表现力，充满内在的动力。

从一开始从事播音工作起，列维丹就非常注意合理地分配力量，特别是在读长句子时。他当时就已经竭力要在长句中找到最主要的字，突出这个字，全句的意思也就清楚了。他坚定地掌握着在话筒前朗读的一条基本原则：要让人听得懂。有人以为这很简单，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文稿本身，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逻辑的规律，还有广播所特有的朗诵规律。

我们不妨从一个播音员的实践中举一个例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初学播音的播音员，而是一个有经验、有权威的播音员，他已有二十年的播音历史。他总是不大注意句子中常见的一个小“逗号”。的确，似乎再没有比下面这样一个句子更简单了：“我们已经报道过，今天晚上在基辅将举行全苏畜牧业青年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逗号之后读时自然要停顿一下，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我所说的这位播音员有一次却把这个句子中的“今天晚上”和前面的半句话连在了一起，结果成了“我们今天晚上已经报道过，在基辅将举行……。”如果这条简讯是在早晨播的话，说“我们今天晚上已经报道过”，那就更加荒唐了。还可以常常听到这样的